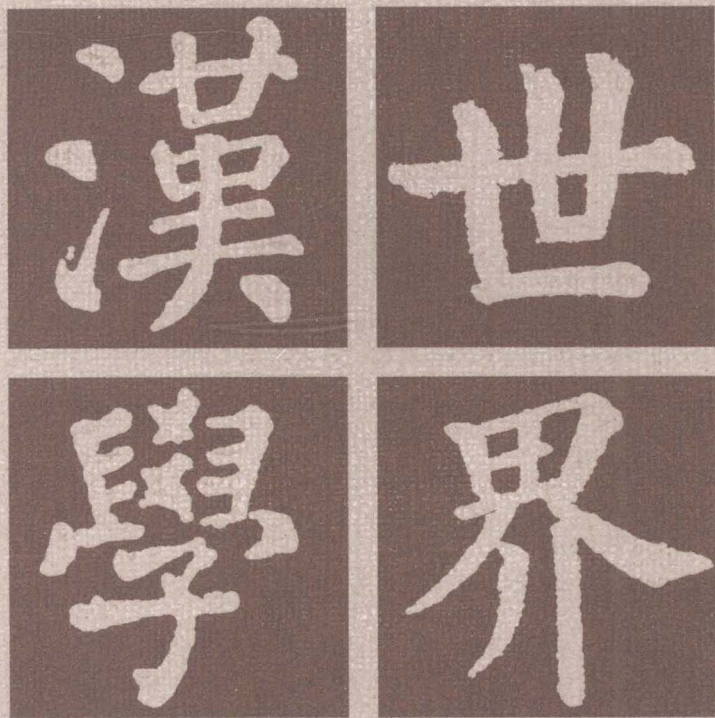


世界汉学·第10卷

World Sinology

Volume 10



第 10 卷

【汉学视阈】汉学与汉学家在德国——过时的概念？·在中国人们吃月亮——19世纪到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重拾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汉学新论】傅斯年的哲学观：诸子与中国哲学·他者的迫害——鲁迅与莱维纳斯·德里达的前人与来者：论中西传统中的言语、文字、命名及语言的起源【汉学史探】范礼安与利玛窦：对华传教之父·《圣经》东游记：《圣经》在中国的互文本阐释·康熙大帝、路易十四与天主教人华·国王数学家：照亮那个时代的人——从康熙大帝与太阳王路易十四特展谈起

【HORIZONS OF SINOLOGY】Sinology and Sinologists in Germany——Obsolete Concepts?◎“In China They Eat the Moon”:

Western Images of China from the 19th through to the 21st Century◎Reflection on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Preliminary

Remarks on the Perspectives of Sinology among Overseas Chinese 【NEW IDEAS IN SINOLOGY】Fu Simian’s Views on Philosophy,

Ancient Chinese Masters, and Chinese Philosophy◎Persecution “of” the Other: Lu Xun and Levinas◎Before and After Derrida: On

Speech, Script, Naming and the Origin of Language in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Traditions 【EXPLOR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漢 世
學 界

第 10 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汉学. 第 10 卷 / 耿幼壮, 杨慧林主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7-300-16495-3

I. ①世… II. ①耿…②杨… III. ①汉学-研究-世界-文集 IV. ① K207.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46032 号

世界汉学 第 10 卷

主编 耿幼壮 杨慧林

Shijie Hanxue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易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210mm×285mm 16 开本	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张	15 插页 2	印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40 000	定 价	7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世界汉学》合作单位

法国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
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系
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
德国华裔学志汉学研究所
英国牛津大学汉学研究所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
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系
葡萄牙大发现纪念全国委员会
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
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
美国耶鲁大学东方语文系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
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
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
日本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部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
台湾“中央图书馆”汉学研究中心
香港大学中文系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



《世界汉学》编辑委员会

陈方正	Chen Fong-ching	加加美光行	Kagami Mitsuyuki
陈平原	Chen Pingyuan	弥维礼	Wilhelm K. Müller
陈庆浩	Chen Qing-hao	任大援	Ren Dayuan
陈荣照	Chen Rong-zhao	李福清	Boris Rifitin
成中英	Chung-Ying Cheng	罗伯特·恰德	Robert Chart
戴卡琳	Carine Defoort	赛奇	Anthony J. Saich
杜维明	Tu Wei-ming	松本三之介	Matsumoto Sannosuke
杜德桥	Glen Dudbridge	史景迁	Jonathan D. Spence
艾尔曼	Benjamin A. Elman	施舟人	Kristofer Schipper
耿昇	Geng Sheng	施耐德	Axel Schneider
耿幼壮	Geng Youzhuang	孙郁	Sun Yu
苏源熙	Haun Saussy	孙康宜	Sun Kang-yi
黄一农	Huang Yi-long	瓦格纳	Rudolf G. Wagner
伊维德	Wilt L. Idema	王德威	David Wang
詹嘉玲	Catherine Jami	王秋桂	Wang Qiu-gui
纪宝成	Ji Baocheng	汪晖	Wang Hui
顾彬	Wolfgang Kubin	巫鸿	Wu Hong
李文潮	Li Wenchao	魏丕信	Pierre-Etienne Will
李学勤	Li Xueqin	吴志良	Wu Zhi-liang
梁治平	Liang Zhiping	严绍璁	Yan Shaodang
林庆彰	Lin Ching-chang	阎云翔	Yan Yunxiang
刘东	Liu Dong	杨慧林	Yang Huilin
刘梦溪	Liu Mengxi	杨煦生	Yang Xusheng
刘显叔	Liu Xian-shu	余英时	Yu Ying-shih
刘小枫	Liu Xiaofeng	乐黛云	Yue Daiyun
鲁惟一	Michael Loewe	查良镛	Cha Liang-yong
罗理路	Rui Manuel Loureiro	张灏	Chang Hao
罗多弼	Torbjörn Lodén	张国刚	Zhang Guogang
马悦然	Goran Malmqvist	张西平	Zhang Xiping
马雷凯	Roman Malek	赵令扬	Chiu Ling-yeong
孟华	Meng Hua	钟鸣旦	Nicolas Standaert
谷川道雄	Taikawa Michio	朱政惠	Zhu Zhenghui

主 编

耿幼壮 (Geng Youzhuang) 杨慧林 (Yang Huilin)

编 辑

樊桦 (Fan Hua) 张靖 (Zhang Jing)

主 办

中国人民大学汉学研究中心

(Centre for Sinology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目 录

【汉学视阈】

- 汉学与汉学家在德国——过时的概念? / [德国] 司马涛 1
- “在中国人们吃月亮”——19世纪到21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 / [德国] 甘默霓 6
- 重拾“美国在中国的失败”——华侨汉学的视角初探 / 刘小枫 14

【汉学新论】

- 傅斯年眼中的哲学、诸子及中国哲学 / [比利时] 戴卡琳 18
- 他者“的”迫害——鲁迅与莱维纳斯 / [新西兰] 伍晓明 37
- 德里达的前人与来者：论中西传统中的言语、文字、命名及语言的起源 / [德国] 柯楚兰 54

【汉学史探】

- 范礼安与利玛窦：对华传教之父 / [意大利] 柯毅霖 61
- 《圣经》东游记：《圣经》在中国的互/文本阐释 / 李炽昌 72
- 康熙大帝、路易十四与天主教入华 / 耿 昇 84
- 国王数学家：照亮那个时代的人
——从“康熙大帝与太阳王路易十四特展”谈起 / 芮 欣 99

【经典诠释】

- 再访孔子：古文本，新言说——法兰西学院授课讲义（2009—2010） / [法国] 程艾蓝 116
- 权威的修辞：《利未记》与《论语》的比较 / [瑞士] 韦 宁 [爱尔兰] 巴 登 129

【艺术史辨】

- 在世界的另一端：移居蒙元中国的中世纪艺术及其语汇 / [加拿大] 裴珍妮 158

十世纪的蜀国——中国视觉艺术史地域篇之一/[法国]傅飞岚..... 178

【文学对话】

作为价值的多样性：边缘性，后殖民主义与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身份特征/[英国]杜博妮..... 193

1997年以来香港小说所表现的女性形象

——以母亲、女儿、妻子为中心/[韩国]金惠俊..... 207

【学者心路】

论汉语学习中思维管理方法的恰当性/[法国]白乐桑..... 222

在中国的学术历险/[英国]贾思柏..... 228

汉学与汉学家在德国

——过时的概念？



司马涛

司马涛 (Thomas Zimmer) / 德国波恩大学

为什么要研究汉学与汉学家的历史？鉴于“汉学”专业已经日益从各大学的课程计划中消失，我们难道不应该谈谈这个问题么？这些年来，许多德国大学把“汉学”专业并入“亚洲研究”中。科隆大学在裁掉一个现代中国文学教授席位的同时，把古典汉学教席改名为“中国文化”，并且将这个新教席与日本学以及印度学教席一起组成了一个全新的“亚洲社会及文化”专业。在波恩大学，这个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专业直到不久前才被重新称为“汉学”，但显而易见，它只是东亚研究所中的一个并不起眼的部门。

考虑到“汉学”专业在德国大学中的历史并不悠久，当前这样的现象着实令人吃惊。20世纪初，在东方研究的大背景下，德国大学开始将“汉学”设立为学术性专业。而在此之前，东方语言学院 (Seminar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 SOS, 隶属于柏林的外交部) 就已经在外语教学的意义上开始了对中国的研究。这个“学院”设立于1887年，当时正值德国与英法列强争夺海外殖民地，它的创立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出于外交政策的需要。

作为一门大学专业，德国“汉学”在相对来说不长的发展史中时常面临着教学人才稀缺的状况。例如，在许多学校——如基尔大学 (Universität Kiel) ——某个教授的教学生涯可以决定这个专业的存亡 (以基尔大学古顾铎琳 (Gudula Linck) 女士为代表)，一旦该教授荣退，汉学专业便不复存在。只因受惠于德国高等教育体制中“特许任教资格” (Habilitation) 这种特殊制度，一些教学与研究工作的至少能够在教授荣退的情况下仍然在一定范围内继续进行。虽然如此，随着教授席位的裁撤，原先为此配备的资金设备与助教岗位通常也会被取消，这个专业在学校的重要性也大受影响，其境况自然堪忧。

即使是那些同基尔大学情况不同、拥有着更长历史传统的汉学系的大学，其教员也通常为数甚少。以波恩大学为例：虽然早在1913年，波恩大学就设立了东方研究系，但是直到1926年，系内才开展了由汉学家施密特 (Erich Schmitt) 主持的以中文为重点的研究课程。随着施密特于1955年辞世，霍布理 (Peter Olbriht) 在此后数年担任中国研究教研室负责

人。直到1963年底，一个独立的汉学系终于成立了，而霍布理教授也获得了该学院的首个教席。此前数年，东方语言研究院也已经在附近重建起来，这个学院的历史更为悠久：早在1887年的柏林，一些东方和亚洲学专家们就在这个学院为外交官们提供相关的培训。关于中国的研究也因这两个相邻的研究机构而得到了加强。不过事隔多年，抚今追昔，我们能愈发感到，即便包括SOS，当时在波恩的汉学力量在数量上也非常薄弱。在逾80年时间里，仅有五个人主持过波恩的汉学研究，除了施密特与霍布理，还有陶德文（Rolf Trauzette）、乔伟（Qiao Wei）和顾彬（Wolfgang Kubin）。其中顾彬教授曾担任SOS的中国研究教研室负责人达十年之久，直到1995年他才接替了陶德文教授在汉学系的教授席位。自2010年来，廉亚明（Ralph Kauz）教授开始主持波恩的汉学研究。

80年时间固不算短，其中出现种种沿袭与变迁也不足为奇。既如此，审视汉学在这个时代的状况，我们最明显的感受又是什么？诚然有成就，但作为一个学科，汉学在许多方面并没有得到发扬光大。至少，它没能作为大学中通常意义上的“专业”得到发展。所谓的大学“专业”，通常是指那些在大学建制中成长，并在其中获得可观的地位的学科。我们看到，尽管几十年来中德交流热火朝天，其间设立的各种研究项目与计划也不计其数，但这个学科在许多大学中的地位仍然并不明确。为了维持生存，汉学往往不得不与其他所谓的“小众专业”合并，形成所谓的“专业群”（Fächergruppen）。弱小的专业通过相互结合维持生存，只有通过合并，小众专业才能确保获得生存的机会。不对当前汉学的这种孱弱状况有所认识的话，无疑是一种过高估计自身角色与意义的危险态度。

回顾这十年来波恩的汉学家们所从事的课

题，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其研究对象之广泛，涵盖了从中国的语言及语言科学，到其文学、历史乃至哲学的各方面，这也是“汉学”概念在最初意义上所规定的核心领域。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汉学长时间以来始终是一门基于文本的学问，汉学学者也首先是凭借语文学方法（philologischen Methoden）进入这些文本的。正是对于文本的杰出理解，连同对自身所受（西方）科学训练的极大信赖，使得一代代汉学家具备了卓越的解释与把握文本的能力——要知道，解读古典汉文及其各种变体，即使对中国本土学者而言也并非易事。

值得一提的还有，当时汉学家们对中国的研究往往出于一种高度的“自我意识”，这也是早期汉学的一个重要标志。只有先知晓自身——亦即通晓西方的文史哲传统——才能理解中国。在汉学的早期阶段，这个理念体现得特别明显：人们将纷繁复杂的中国视作陌生的外来者，将其保持为一个整体来理解。但与此同时，一种根本性的转变也无疑拉开了序幕。首先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受到美国学界的显著影响，人们开始更多地考虑在学术研究中引入全新的模式与方法。随着中国这个概念被“解构”为一系列话语（Diskurse），传统意义上的汉学也被消解为诸多不同领域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学者的关注点也转向了“社会政治体制”、“统治意识形态”、“殖民地的过去”、“文化潮流”（Kulturströmen）以及“日常娱乐文化”之类的论题。

经历过这些变化与沿承，当今汉学界的面貌如何？由于这个专业的规模狭小，它发生的变化往往是经由个人而非某种传统达成的。每一位教授都带有自身的研究侧重点，它们往往因继任者的到来而发生变化。考虑到汉学专业错综复杂的属性，这种情况几乎是必然的了：

因为我们很难想象，当前有任何一位专家能够对整个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包括古典与现代，连同各种口头与书写上的变化）作同样深入的把握——每一位同仁都会心照不宣地承认：这是个不可完成的任务。可以说，就其研究人才而言，汉学始终处于公认的匮乏状态。

前些年，德国的汉学（当然不只是这一专业）引入了本科与硕士制度，这可算是最大的变化了。由于改革的时间还不够久，我们不能现在就谈论各种经验，而且变革的发展和后果现在也还不能通观清楚。但是，人们可以认为，消失的绝不仅仅是一个学科的名称。诚然，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汉学向各种新的研究方向，比如区域性研究等等的分化就已经出现。在这些新方向中，汉学也完全有可能被合并到某个此前并不被人们所熟悉的研究领域中去。但目前的状况是：许多大学中，“汉学”这个字眼往往只被放在括号中，点缀在诸如“中国语言文化”、“中国研究”这类新名称的后面；课程的细分与“模块化”、迅速的考试与结业，种种做法都表明，人们在幻想短时间内就让学生“把握”那些内容——但是要知道，这些内容恰恰是前人通过长时间的奉献与极为艰苦的努力才获得的成果。被置于括号中的“汉学”概念，更像是出于自我确证的目的，作为对往昔的回忆而存在。

实际上，作为一门学术专业的“汉学”，它的性质、发展及其扮演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也与中德交流状况的紧密程度、方式等息息相关。对于汉学研究者而言，这种交流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汉学研究者关注的是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由于缺乏在中国长期驻留与研究的机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代的汉学学者大多只能通过与中国教师在研讨课上合作或者请教旅居德国的[中国]学者的方式，间接地获得关于中

国的资料。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联邦德国的学者才真正获得长期在中国大陆进行学术访问、开展研究项目或类似活动的机会。

在笔者看来，为了更好地把握汉学的现状，了解汉学在德国的早期代表人物是十分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可以借此看清那个时代的学术状况与当前的根本区别。以下笔者打算以汉学家葛禄博（Willhelm Grube）为例加以详述。葛禄博在汉学史占有一席之地，因为他不但兼具语言学家、民族学家与汉学家等多种身份，而且还是中国文学最早的译者之一。由于新近对于葛禄博的研究使他获得了很高的知名度，在此笔者不妨再详细说一下他的生平经历。^[1]

用当代的语汇说，葛禄博一生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他在多元文化及多元语言环境中形成的“国际文化”背景（“interkultureller” hintergrund）。葛禄博于1855年8月17日生于圣彼得堡，他的父亲是位德国商人，自1833年起就迁居俄国。中学毕业后，葛禄博于1874年至1878年在圣彼得堡大学学习哲学和语文学。在此期间，他对汉族与满族的语言文化产生了独特的兴趣。葛禄博的老师包括王西里（V.P. Vasiliev, 1818—1900，汉学与佛学专家）、郭伦斯基（K.F. Golunskij, 1831—1899，蒙古语言及文化专家）、杂哈劳（I.I. Zacharov, 1814—1885，满语学家）以及戈里格罗威（V.V. Grigorev, 1816—1881，历史学与东方学家）。此外，葛禄博与席夫纳（Franz Anton Schiefner, 1817—1879）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并且修习了后者开设的藏语及乌拉尔-阿尔泰语言课程。结业考试之后，葛禄博于1878—1880年期间赴莱比锡继续进修中国研究和语言学，师从贾柏莲（Hans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1840—1893）。他在1880年完成博士论文，次年完成教师资格论文，研究的都是基于宋代《通书》之满汉文手抄本的中国

哲学问题。

在莱比锡继续停留了两个学期之后，葛禄博在1882年开始担任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亚洲博物馆的管理员。但仅过了一年，他就在柏林刚刚创建不久的民族学博物馆找到了新职位。从1885年起，在博物馆的工作之余，葛禄博开始在柏林大学授课。1892年，他在主要无偿讲授汉文与满文课程的时候，获得了一个编外教授职位。

1897—1898年期间，葛禄博获得了长假，以便更好地进行亚洲研究。博物馆拨给了他一笔不多的费用，用于在亚洲收购藏品。1900年春，为了有更多时间从事学术研究，葛禄博最终辞去了博物馆的工作。尽管葛禄博所在的院系多方奔走，但他始终没有获得正式的教授职位。不过自1904年起，葛禄博作为编外教授每年可以得到2400马克的一笔薄薪度日。1908年7月2日，葛禄博因长期的病症在柏林逝世，遗留下不少尚未完成的重要课题。葛禄博去世后，他的若干重要著作经其学生编辑整理，最终得以发表。

那么葛禄博的研究重点究竟是什么？他给后世留下了哪些最重要的知识遗产？

葛禄博那一代早期汉学家的重要特点，就是他们对中国文化横跨各专业领域的论题都有着广泛的兴趣。受到在莱比锡学习时的导师贾柏莲的影响，葛禄博最初从事的主要是语言学方面的研究，他甚至在莱比锡创立了一个普遍语言学学会。在柏林期间，葛禄博还对大洋洲的语言进行过广泛的研究。

葛禄博最初的长篇学术著作则与中国哲学及语法学相关。以地理学家施伦克(Leopold von Schrenck, 1826—1894)于19世纪90年代在黑龙江流域搜集到的语言材料为基础，葛禄博在1892年出版了《基里亚克语词典》

(*Giljakisches Wörterbuch*)。^[2]由于葛禄博对这部词典倾注的巨大努力，该书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这个领域的标准版本。葛禄博同样杰出的著述还有《戈尔德—德语词汇索引》(*Goldisch-deutsches Wörterverzeichnis*)^[3]，该书于1900年出版。在其1896年对于女真族语言文字的研究中，葛禄博将女真族语言的文本与摘自明代会同馆(四夷馆)汇编的一本外语翻译手册中转抄的汉语版本进行了比较，并据此论证了女真语是满语的前身。

1901年出版的《论北京民俗》(*Zur Pekinger Volkskunde*)^[4]一书，被普遍认为是葛禄博最重要的学术著作。基于他的民族学工作，以及通过细致的文献与详实的描述，葛禄博为早期中国民族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此外，葛禄博对一系列文学作品坚持不懈的翻译活动，也让人体会到其良苦用心：他力图使文学作品成为对民族学研究有用的材料。

这就不得不提到葛禄博汉学学术活动的第三个领域：文学翻译。1902年，葛禄博编著的《中国文学史》^[5]得以出版，这是德语世界第一本有关中国文学通史的著作。正如该书导论中写的那样，这本书不专为研究人员准备，它面向的是广大普通读者。在这本书中，葛禄博介绍了中国的古典散文、哲学、诗歌以及戏曲、小说乃至史书各方面的状况。葛禄博这部著作的重要价值在于，它在汉学研究尚处于萌芽阶段的时候，就提供了关于中国文学史的标准版本。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其只是不断加以补充完善，它的地位直到不久前才被取代，至少是在与外国相关的书籍方面。葛禄博通过对一系列选文的译介，为德语读者敞开了中国文学的广阔视野，这在他那个时代是独一无二的。

由于早逝，葛禄博有两部计划中的重要著作尚未完成，即于1908年由其学生整理出版的

《封神演义》的德译本，以及一部关于中国皮影戏的研究著作。葛禄博在其中的贡献主要是译介方面的。^[6]

总而言之，作为第一代汉学家的成员，葛禄博的生平经历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范例。他对各种题目的广泛兴趣，以及他通过科研工作所揭开各种不同的领域，看起来都是无与伦比的。我们还可以看出葛禄博在俄国以及后来在德国的老师们对他的强烈影响。由于本文篇幅所限，那些重要人物只能一笔带过。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实际上对葛禄博学术研究产生影响的圈子，要比我们所知的宽广得多。例如，根据葛禄博在1897至1898年亚洲旅行时的书信可以推知，他在中国的民族学研究得到了某些方面的重要支持。在葛禄博刚刚抵达北京后，他就曾直接和一位学者联系，并与这位学者共事了一段时间。可惜的是，我们始终无法确定该学者的身份，他的名字也没有出现在葛禄博的任何著作中。此外，葛禄博在实地考察中还得到过哪些方面的支持，我们也无从知晓了。

葛禄博与其他许多早期汉学家选择了一种首先以民族学及语文学搭建起来的路径研究中国，这个方法的优势在于：它能够使人们在整体语境中把握中国文化，并将其视作外来的他者，与自身（亦即西方）文化进行比较。由于当前各学科的不断细分与专业化（如前文所述），这种研究中国的方法对于“汉学”来说已经不再可行。面对汉学的这些变迁，我们仍然必须追问的是：一种对中国真正的、有据的理解究竟是否还有可能？

（王师译，韩隽校）

注 释

[1] S. Wilhelm Grube, *Leben, Werk und Sammlungen des Sprachwissenschaftlers, Ethnologen und Sinologen* (《语言学家、民族家与汉学家葛禄博的生平、著作以及文集》), bearbeitet von Hartmut Walravens und Iris Hopf,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07.

[2] S. Wilhelm Grube, *Giljakisches Wörterbuch* (《基里亚克语词典》). Bd. 3 von L. v. Schrenck: *Reisen und Forschungen im Amur-Lande in den Jahren 1854-1856* (《1854—1856年在黑龙江流域的旅行与研究》), St. Petersburg, 1892.

[3] S. Wilhelm Grube, *Goldisch-deutsches Wörterverzeichnis mit vergleichend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übrigen tungusischen Dialekte* (《戈尔德—德语词汇索引及其与其他通古斯方言的比较研究》), St. Petersburg, 1900.

[4] S. Wilhelm Grube, *Zur Pekinger Volkskunde* (《论北京民俗》), Berlin: Spemann, 1901.

[5] S. Wilhelm Grube,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 (《中国文学史》), Leipzig: Amelangs Verlag, 1902.

[6] 参看 *Feng-Shen-Yen-I. Die Metamorphosen der Götter* (《封神演义：诸神的变化》), Leiden: Brill, 1912。葛禄博翻译了这部历史神话小说的第1至第46回。全书的内容提要及第47至第100回的翻译由缪勒 (Herbert Müller) 完成，缪勒同时也是该书的编者。另见 *Chinesische Schattenspiele* (《中国皮影戏》), übersetzt von Wilhelm Grube, München: Verlag der Königlich Baye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15。本书由埃米尔·克里布斯 (Emil Krebs) 根据葛禄博遗留手稿整理完成，贝特霍尔德·劳费尔 (Berthold Laufer) 编辑并完成导言。

“在中国人们吃月亮”

——19世纪到21世纪
西方的中国形象^[1]



甘默霓

甘默霓 (Monika Gaenssbauer) / 德国埃尔兰根大学

2009年10月,将中国列为主宾国的德国法兰克福书展开幕,德国周刊《时代周报》(*Die Zeit*)在其首页上刊登了一张造型古怪的中国瓷雕人物图片,编辑在图像旁写道:“以全新的方式解读中国”。但是,在我看来,在这张图片及《时代周报》的相关评述背后,隐含着相当陈旧老套的中国形象,将“这个东方国度表现成了一个活生生的‘古董橱’”^[2]。实际上,这个被刊印的塑像大约产于1740年,是雕塑家约翰·弗里德里克·埃伯莱因(Johann Friedrich Eberlein)为著名的萨克森州迈森市皇家瓷器厂创作的作品。在德国作家布里吉特·克罗纳威尔(Britte Kronauer)为《时代周报》撰写的图片说明中,她再度套用一些刻板的、模式化的中国形象,比如“微笑的国土”(Land of Smiles)这个一百年前弗兰兹·雷哈尔(Franz Lehar)在其盛极一时的同名轻歌剧中所塑造的形象。克罗纳威尔如此评论这个头上戴着帽子、看上去像座宝塔似的瓷像,“这些来自远东的小玩意真的很古怪!”她在文章结尾处反问道,这个“东方的瓷潘趣(Punch)”不会想要“把我们西方人吃掉吧”^[3]?

一个与此非常类似的图片曾作为“典型中国人”的漫画形象出现在1885年的美国杂志《黄蜂》(*The Wasp*)上。^[4]那个双面形象神秘莫测,超乎自然地拥有许多双手,而这些手可以让西方人的荷包空空,或决定他们的命运。这一点也许会让我们惊讶,因为这两个代表中国的形象相隔了一百多年,竟如此相像,甚至采用了几乎完全一致的形象。

在接下来的分析中,笔者将根据19世纪西方作者们所提炼出的中国形象,展示中国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d image)是如何持续存在的。这种形象的存在时间并不仅仅是过去的一百年,而是几百年之久。本文不仅仅涉及汉学领域,还触及后殖民研究及文化研究。本文的论点及题目中的“西方的中国形象”可能确实隐含某种“本质主义”(essentialist)的对“西方”整体的指称。因标题必须简短,只能缩略,难免会扭曲主题。本文会涉及一些具体的美国和欧洲作者,因此所提之“西方”是一个大而化之的概念。笔者在分析由这些不同作者所提炼的“中国形象”时,会注意找出并强调每个作家所提供的代表性形象中彼此不同的方面,这与宗

教史学家安德烈亚斯·内林 (Andreas Nehring) 在他的著作《东方主义及基督教差传使命》 (*Orientalismus und Mission*) 中对印度的研究方式类似。^[5] 与印度情况一样, 这些在 19 世纪描述过中国的欧美作者, 各自背景大相径庭。他们中一部分人是传教士; 有的是从使馆工作人员或翻译的角度发表见解; 还有一些则是以商人或药用植物样本采集者的身份来到中国。19 世纪时, “中国研究” 还不是一个由专家学者主导的领域。在这个时期, 学术汉学研究刚刚起步。一位前任传教士完全有可能去大学任汉语教授, 或者像纽曼 (Karl Neumann) 这样, 原来是亚美尼亚语专家, 后来做了教师, 最后获得慕尼黑大学汉学图书馆馆长一职。

此外, 在考量 19 世纪的中国形象时, 完全有可能无法同时参考那些在前几个世纪已经广为流传的形象。事实上, 许多当代中国形象都可以找到 19 世纪之前的原型。

汉学家朗宓榭 (Michael Lackner) 在分析耶稣会传教士范礼安 (Alessandro Valignano, 1539—1606) 笔下的中国形象时曾指出, 范礼安不太关注描述中国的现实, 却把更多的心思都花在构建中国本质上的“异质性”上。朗宓榭甚至提出了一个“纯粹欧洲史” (purely European history) 的说法, 认为中国在这种历史中不过是西方国家内部智力角斗的一颗棋子。^[6] 毫无疑问, 这在利玛窦眼中则是另一种情形。他也是一位耶稣会传教士, 却至今在中国享有盛誉并备受尊敬。自 2007 年以来, 文学理论家拉维尼亚·布兰卡乔 (Lavinia Brancaccio) 在其研究中将利玛窦的“他者的视角”解释为具有开放、关注以及好奇 (*curiositas*) 等特征的视角。她认为, 利玛窦真诚地做好准备, 让自己适应他所接触到的“他者”并因此而舍弃一部分他自己长久以来所拥有的身份。^[7] 在与他同时代的

其他描述中国的作者身上罕见这种好奇的品质。

18 世纪时, 康德 (Immanuel Kant) 自信这样的说法颇为公正: “中国人……从不暴露他自己的想法, 却总是想方设法刺探别人的内心……在欺瞒功夫上, 他们是非凡的艺术家”^[8] (意思是: 非同寻常地精明狡诈)。正是比康德稍年轻的同时代人赫尔德 (Herder) 第一个将中国描绘为“僵尸般” (mummified) 的民族。赫尔德预言, 在未来的几个世纪中, 中国文化将一直是一种“完全孤立”的文化。^[9]

18 世纪以来, 亚洲是被当作欧洲最大的对立面 (counter-principle) 来构建的, 到 19 世纪, 有关亚洲的模式化形象逐渐定型。极少有西方作者能避免参与到这个定型过程中。在 1806 年有关亚洲事务的一本新杂志之纲领性前言中, 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话: “亚洲人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模式都和我们自己的大为不同。”^[10] 文学理论家霍米·巴巴 (Homi Bhabha) 曾将刻板印象描述成为一种知识和认同的方式, 始终徘徊在“在场” (in place)、已知之物和必须急于重复的事物之间。^[11] 历史学家本杰明·施密特 (Benjamin Schmidt) 曾指出, “刻板” (stereotype) 这个概念本身来自印刷业。一个铅板的生命仰仗的是被取出、被印制、一遍一遍重复。只有通过这种重复才能让它获得其真实和权威的外观。^[12]

游记是 19 世纪描写中国的一种重要文体。“那些旅游书籍,” 玛丽-路易斯·普拉特 (Mary-Louise Pratt) 写道, “创造出一种猎奇、刺激、探险的感受, 甚至能制造一种对欧洲扩张主义的道德激情。他们……使得那些在欧洲‘足不出户’的人们感觉自己也成了全球规划中的一部分。”^[13] 18、19 世纪时, 一个“旅行家”是很有可能成名的。这类“旅行家”一心想成为学者及社会精英分子。他们中国之行的目的一般

都带有科学考察或传教性质，因此他们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和尊重。他们所收集到的信息资源可以在他们本国的各种帝国主义规划中派上用场。

著名旅行家古伯察 (Evariste Regis Huc, 1813—1860) 在 1855 年出版了一本书，题为《中华帝国游记》(The Journey Through the Chinese Empire)^[14]。古伯察是一位法国罗马天主教遣使会传教士，他为西方公众献上了两部穿越游记，在当时引起广泛关注，因而屡被称为“发现者”。在 18 世纪及 19 世纪上半叶，尚无其他媒体可以和此类游记抗衡，它们独占对世界边远地区的描摹表现权，无人能挑战之。用来塑造亚洲文明形象的材料就是这些文字和绘画——在某些情况下是木雕。

古伯察把中国描写成一个“陷于最深重的政治冷漠之中的……大国”^[15]，却在“忽然间被太平天国运动摇了它的根基”。太平天国是受基督教思想影响的农民起义，恰好就发生在古伯察写游记的年代，这场运动几乎摧垮了清政府。

古伯察竭尽全力去“尽可能地更正那些从远古时期开始就盘踞在中国人头脑中的错误荒唐的想法”^[16]。在他看来，16 世纪的耶稣会传教士们“经常发表……描述中国的文字，其中奉承话太多，难以置信”^[17]。在这幅过于迷人的图画上，他找到的第一个污点是，他看到中国各地“对正义的嘲弄”。在他的游记中，他反复自豪地记录了他如何胆大包天地公然对抗中国地方官员，故意不理睬他们的权威。比如，在第一章中，他解释道：“作为外来者……我们无须顺从这个王国的老规矩。”^[18] 在另一处他写道：“我们……执拗地……坚决不去他们想要我们去的地方。”^[19] 为了给中国人一个教训，让他们看看在每个特定场合下到底谁说了算，他总

是受到挑战。当一些和他交谈的中国人问及他来中国的原因、他希望借此得到什么时，古伯察列出一个很长的单子，都是他认为中国可以从西方那里得到的东西：基督教、随之而来的学校和慈善活动，但在这一切之上是“真理”。古伯察自己在中国的收获是一个以前从未有过的想法。他把他的中国之行看做一种奉献——一种“承担”，用纪伯伦著名的话说就是“白人的重任”。这位英国作家在 1899 年的诗中鼓励西方帝国的使者们，即便是面对那些竭力抵制所有善意努力的、“愚蠢的异教徒”，也要“喂饱那些饥饿者，让疾病消退”^[20]。

历史学家于尔根·奥斯特哈梅尔 (Jürgen Osterhammel) 注意到，直到 19 世纪之前，中国对西方都毫无兴趣。但是自认为是世上最强大、最人性化的文明——也就是西方文明——并无耐心等着亚洲开始对之感兴趣。它把自己的规则强加给亚洲。在一个以“肩负教育使命”为主导思想的年代，这种腔调变得严厉又肃穆，真的是一副教训的模样。欧洲人必须治理和启蒙亚洲，要从经济上开发、在科学上探索亚洲。亚洲成了欧洲人工作的对象。^[21]

赛义德 (Edward Said) 也正是聚焦于这一点上，提出了他最为合理的批判。赛义德指出，许多西方作者认为东方是世界上一处有待“修正” (correction) 的地方，因此它就得被放置在教室和法庭之类的框架体系中去修改。

古伯察是否真的到过那些他在游记中描述的并在当时给他带来名声和财富的地方，至今无法确认。从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在这些游记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显然不合情理因而只是貌似真实。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古伯察对他同时代的以及下一代的其他作者有很大影响。比如德国热门作家卡尔·迈 (Karl May, 1842—1902) 的小说《江路》(The Kiang-Lu) 就受到

了古伯察那激动人心的游记的启发。我们从卡尔·迈的作品中读到：

中国！东方最不可思议的国度！一条由泥土和岩石构成的巨龙，把它的锯齿状的尾巴浸入深深的太平洋，一只翅膀挨着冰封的西伯利亚，而另一只抵着湿热的印度丛林，被呼啸的台风吹到海岸边，爬过山巅河谷，面朝西方，即便隔着我们最高的山脉，亦隐约可见它那强大的头颅……我敢靠近你吗？我那双异域的眼睛能承受住你眼神中那敌意的幽光吗？^[22]

另一位19世纪时生活在中国并写作有关中国轶事的作者是密迪乐（Thomas Taylor Meadows, 1812—1845）。密迪乐先是一位翻译人员，后来成为英国领事。他在广东和上海待了十多年。密迪乐有关中国的作品展现了和古伯察迥然相异的图景。与他的同行们相比，密迪乐对中国的评价更中肯，能考虑到细微差异并能区别对待。在1874年的著作《漫谈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Desultory Notes on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China*）^[23]中，他有意识地不从个案去得出一个普遍性的结论并加以谴责。比如，他不会因为某一次他恰好中了一个中国人的诡计，就说所有的中国人都阴险狡诈。^[24]密迪乐试图甄别出他所经历的诸多特殊交往中，每一次不同的人所怀有的各自不同的动机，而不是急于兴师问罪。再如，他描述了中国人如何冒着有可能被官府严惩的风险为外国人传递信息。他提出，这或许是中国人在和外国人打交道时倾向于不“把所有的牌都摊在桌上”的一个重要原因。^[25]密迪乐显然对某些西方人的一种习惯非常不满，这些人随意地依据自己的感觉为整个民族套上笼统的特征。他警告道，这类负面的描写会使得国家彼此之间的印象恶化，甚

至最终很有可能引发战争。他也不认同当时的一种普遍看法，即认为19世纪时的中国政府是专制统治。他反而认为，中国大体上是建立在一种基本道德权威基础上的国家。他甚至推荐道，如果英国能采用中国选拔地方官员的科举考试体系，将不无裨益。

法国传教士古伯察在他的作品中并未突出传教本身，而当时的其他作者则更加全身心投入地思考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问题。我们经常可以从19世纪在中国的传教士文章中看到一个矛盾：这些作者出于其基督教信仰，理应捍卫人生来平等的观念，但这个理念与他们那个年代普遍流行的种族歧视自相矛盾。毕竟，在19世纪晚期欧美人的每一种政治理念中，种族主义都被认为是不言自明的看待世界的正确途径。^[26]

这种反差在美国传教士麦利和（Robert Maclay）的一本书中尤为明显。这本书写于1861年，用了这样一个题目：《生活在中国人中间》（*Life Among the Chinese*）^[27]。在开篇第一章涉及中国人口时，麦利和惊喊道：“四万万！他们是谁？……和我们一样的血肉之躯！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是异教徒、忤逆之徒，他们错谬的黑夜没有一束光芒；他们崇拜偶像，对着泥塑木雕顶礼膜拜……他们是什么？是上帝创造的人；失落的、毁坏的、无助的……陷于罪责中的人……神啊，请赐怜悯于他们。”^[28]我们发现，这些传教士的作品常常在不同体裁之间转换。冷静地描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时，会忽然间——通常几乎没有过渡——就转为用极其情绪化的语言和意象进行宗教说教。这样的作品令人不禁想问，这些作品是写给什么人看的。传教士们主要是为他们本国的读者群写作的，而这些读者群主要是神职人员及教堂会众。他们的雄辩口才一般是为了宗教宣导的目的，同时也是为了给他们后续的宣教工作筹款。

麦利和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而且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他似乎已胸有成竹：“我们该如何给中国人归类？在世界各国中我们该派给他们什么样的角色和位置？”他给出了他自己的答案：“他们并非蒙昧初民，亦非村野莽夫。我们必须得称他们是文明人。”^[29] 毕竟，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都是中国人发明的。然而，这一点并不能阻止麦利和稍后把书中相当一部分篇幅用于描述“中国人的性格缺陷”。

19世纪的西方作者几乎一致同意，中国文明可以比非洲文明高一个级别。对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来说，中国文明的排名不过略低于西方文明而已。然而，西方作者们又几乎同声悲叹中国的僵化和没落。不管所写的具体内容是什么，19世纪时几乎每一位单独发表过任何与中国有关的见解的西方作者，都感到自己有义务同时也有资格，呈现给读者有关这个国家及其民众之“本性”的“宏大叙事”（master narrative）。许多句子以这样的话开头：“中国人是……”在大多数从这一时期传下来的关于中国的著作中，我们发现一种“话语本质主义”（discursive essentialism）倾向，正如赛义德在驻埃及殖民官员克劳默勋爵（Lord Cromer）出版的作品中所注意到的“东方人心性”（the oriental mind）一样。在克劳默勋爵的书《埃及》中，他宣布了这样的结论：“一种特定的不精确的倾向，很容易就堕落为彻底的不诚实……是东方人心性的显著特征……欧洲人在本质上是受理性指引……而东方人的心灵，如同风景如画的道路，很明显地缺乏对称性。”^[30] 当时的许多作者都试图给中国以及“中国人”的本质特征找到这类干脆利落、一目了然的解说模式（formulae）。^[31]

但是，从传教士们表现中国的画面，以及他们感受和理解他们在中国的传教工作的方

式，可以看出不同的西方传教士之间的巨大差别。在早期，就跨文化处境下的西方传教方法而言，从深思和自省的立场出发所取得的成就可以在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的著作中找到例证。卫三畏原本希望成为一个植物学家，但他遵从了父亲的意愿，作为美国公理会海外传道部（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简称美部会）的印刷工被派遣到中国。卫三畏从事了好几个职业，他是语言专家、出版商，还是汉学家。临终前他被聘为耶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是美国这一专业领域的首位学术专家。

他去世后出版的《卫三畏的生活与信件》（*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32] 中包含了很多作者的个人思考。例如，他极为坦诚地描述了他年轻时去教堂做礼拜时的情形：“当我去巴黎山时……威克斯先生是牧师。我听他布道毫无欢喜可言，因为教堂里很冷，椅子又硬，礼拜很长，布道单调沉闷，主题又很乏味。年轻时宗教对我并不是件开心的事。”^[33]

尽管如此，卫三畏的确认同自己的基督教身份，并认为这一信仰应得到广泛传播。然而不久他就与其他基督教传教士的“快速行动”（fast-acting）实践理念分道扬镳，这些传教士们以让中国人转信为目标，四处分发一些现成的、由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Karl Gutzlaff）在中国时创作的传教宣传册。卫三畏有一次写道：

今天我登上泊在码头的几条船……我们受到了热情招待……礼貌的天朝人然后……递给你一根烟管，一支香烟，或是一杯茶。这些之后还有什么？一个人跟他们谈宣传册和圣经中的事，但他们好似聋人般根本没听进去，他们沉默地听着……这个主题很陌生，讲话者也很奇怪……但是当你停顿下来等着答复时，他们